

“人之死” ——论乔治·奥威尔《1984》中极权运作下的主体消亡

张 艳

(淮海工学院 国际学院, 连云港 222005)

摘要:《1984》隐喻地呈现了一幅极权主义统治的梦魇图景。在后现代主义空间及语言双重转向的视阈下, 依托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同时结合其理论视野中互为一体的身体、空间和凝视等观点对文本进行解读, 揭示极权统治得以延续的秘密, 说明现代主体在极权运作下解体和消亡的必然性。奥威尔以一种后现代的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空间, 以此启示人类找寻走出极权生存困境的新途径。

关键词: 极权; 福柯; 主体消亡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5)02-0160-04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2.012

“Death of Subject” Within the Totalitarian Operation in George Orwell’s 1984

Zhang Y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1984* metaphorically presents a nightmarish picture of totalitarian rule. Against the postmodern turnings of space and linguistics, this essay interprets the secrets of totalitarian rule in light of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discourse combined with his views on body, space and gaze, and thus reveals the inevitable “death of subject”. Hence an insight into Orwell’s dystopian attitude and an approach out of the predicament is duly gained.

Keywords: totalitarianism; Foucault; death of subject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03—1950) 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家之一。《1984》(1949) 是其代表作, 与《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 和《我们》(*We*, 1921) 一起被列为反乌托邦文学的三部代表作。小说隐喻地呈现了一幅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梦魇图景。因其笔锋犀利地抨击了泯灭人性、扼杀自由的极权主义社会, 奥威尔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1984》一经出版便吸引了大量西方学者的关注。大多数研究者关

注和评论的热点是其作品所体现的政治主题。欧文·豪 (Irving Howe) 于《再读〈1984〉, 我们世纪的极权主义》(*1984 Revisited: Totalitarianism in Our Century*, 1983) 一书中将《1984》所呈现的政治问题与他所处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史蒂芬·英格 (Stephen Ingle) 所著的《乔治·奥威尔的政治生涯》(*George Orwell, A Political Life*, 1993) 梳理了奥威尔的生活经历和他政治书写的嬗变过程。对奥威尔的作品作了比较全面研究的是

收稿日期: 2013-11-17

作者简介: 张 艳 (1979-), 女, 讲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E-mail: lisa5420@sohu.com

J. R. 汉蒙德 (J. R. Hammond) 著的《乔治·奥威尔小说、文献及散文研究参考集》(A *George Orwell Companion: A Guide to the Novels, Documentaries and Essays*, 1982), 该书收集了对奥威尔研究的最权威的评论文章。

国内学术界对奥威尔的研究随着 1985 年简体中文版的出版也逐渐展开。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1984》进行了阐释, 但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讨论文本所体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思想以及奥威尔的人本主义关怀。近几年, 有研究者从女性主义和空间哲学角度对文本进行解读, 说明对奥威尔的研究已逐渐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然而, 鲜有研究从法国历史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福柯通过对西方思想史的考古学分析, 得出“人之死”的结论, 认为“人”是“新近的造物”, 刚刚诞生, 便迅速走向衰亡, 他的存在还不足 200 年, 人“就同大海边沙滩上的脸, 注定被抹去”^[1]。这里福柯所说的“人”并不是指实体的人, 而是抽象概念的“人”。福柯的这一有关主体消亡的论断解构了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理论视阈下大写的、本质的、绝对的“人”, 认为“人”是被知识建构的产物, “人乃是在外在性之中, 在事物的沉重记忆之中, 丧失了他的真相”^{[2]532}。《1984》中, 以主人公温斯顿为代表的个体意识受到极权社会结构潜移默化的渗透, 在权力/话语的塑造下不再是独立自主的主体, 沦为屈服于极权奴役、并自觉维护极权统治的驯顺的思想同质体, 借用温斯顿的话即是“我们是死者”, 这与福柯发出的惊人之论相契合。

在后现代主义空间及语言双重转向的视阈下, 本文主要依托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同时结合其理论视野中互为一体的身体、空间、凝视等观点对《1984》进行解读, 论证奥威尔如何通过将视野转向极权话语控制下被压抑和被边缘化的异质个体来揭示极权统治得以延续的秘密, 以此说明极权统治下主体的客体化命运, 得出主体在极权运作下消亡的必然性。

一、权力对主体的空间规训

《1984》里的空间描写随处可见, 这些空间表征符号蕴意深刻, 揭示了极权统治通过权力弥散的空间对主体进行的空间规训。“空间转向”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界出现的一个新的思想维度: 空间不再是一个不具任何特性的物质性的容器或者舞

台, 而成为社会性的空间。空间也是福柯权力/话语批判的中心问题之一。福柯曾这样解读空间的重要性: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3]488}而谈到空间就不得不说身体, 因为“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 正是不能被简化还原、不可颠覆的身体”^{[4]216}。在福柯看来, 空间与身体之间不仅充斥着紧张的权力统治关系, 身体更成为空间的“权力铭刻物件”, 掌权者通过权力的空间化建构来实现其统治个体的目的。

《1984》中,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人民已不同于莫尔的乌托邦社群, 过着世外桃源的美好生活。相反, 这一美好的极致之境被物质极度贫乏、人性极度压抑的乌托邦空间所替代。大卫·哈维曾说: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双重后果的对立——前者是以开放性和可能性为中心的人类解放前景, 后者是以物化和等级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统治现实。”^{[5]5}极权统治通过利用空间这一生产资料, 将大洋国区隔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空间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严格控制, 并实现其权力运作。雄踞金字塔顶峰的是党的最高领袖老大哥。没有人亲眼见过老大哥, 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 电幕上的一个声音”^{[6]216}。他青春永葆, 不会死去。与其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他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影射, 代表着暴虐和专制, 不如说他是抽象的不在场的符号能指, 是代表权力和文化权威的拉康式的“象征性父亲”。

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 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 党员们生活在社会的中心区域。外围党下面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失语无声的无产者群众, 他们占大洋国人口的 85%。大洋国这种金字塔式的极权统治严格地分割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公共空间自不用赘述, 党员和无产者活动的区域界限分明, 无产者生活在黑暗的、被人遗忘的社会边缘, 党员一般不允许进入无产者的生活领域, 反之亦然。其次, 受自我意识主导的私人空间也受到侵占和废除。为了有自由呼吸的空间, 生存在极权空间禁闭下的温斯顿冒着生命危险在无产者区域租了一间房屋。在那里, “自己独自一人, 没有顾虑, 没有眼睛盯着你, 没有声音逼着你, 除去水壶的低吟和座钟友善的呢喃, 你的身边万籁俱寂”^{[6]140}。可是这个愿望终究以他的被捕而破灭。

可见, 金字塔式的级层空间像一张权力大网将大洋国民众的身体圈限起来, 使之沦为权力规训的客体对象。在极权空间的隔离下, 大洋国的个体皆

成为切断了社会联系和家庭纽带的分子化的孤立的个体或“孤生”之人,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7]592}。

此外,101号房更是对身体进行知识/权力铭刻,类似“圆形监狱”的典型场所。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密闭空间里,人的生命被肆无忌惮地践踏,甚或屠杀。福柯认为权力并不一直都是压抑的,权力也可以起着某种建设性的作用。除了具备对肉体和精神进行双重破坏的力量,101号房这个权力场成了生产一种符合极权统治需要的新的主体的改造实验室,实践着对那些可疑的越界者进行思想规训和个人重塑的目的。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我们当中死去的人越多,我们所处的种族就越纯粹”^{[8]275}。进一步说,101号房“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7]548},确保个体拥有规范齐一的思想,才能确保极权统治的顺利运行。

二、权力“凝视”对主体的标准化改造

极权统治对个体进行知识/权力的空间铭刻与监视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凝视”是观看的一种方式,但凝视不仅是看,它显示了一种心理上的权力关系,即凝视者优越于凝视的对象。福柯曾说:“对权力的运作是和凝视的动力学分不开的。”^{[9]128-129}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认为金字塔形监狱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层面上”^{[10]197}。

《1984》中最令人惶惶不安、如同芒刺在背的监视者便是处在金字塔顶端、象征着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大大哥。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个人空间,没有人能躲开老大哥那上帝之眼的凝视。他“那张留着黑胡子的面孔从每一处关键的方向朝下凝视着你”^{[6]75}。有一次,当温斯顿打开儿童教科书的首页时,老大哥的脸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禁感到“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刺穿你的头颅,压迫着你的脑子,使你感到害怕……到最后,即使说二加二等于五,你都会相信它”^{[6]129}。大洋国俨然成了一个监视社会,监视成为掌权者控制个体思维模式的统治工具,个体在权力之眼的凝视下逐渐丧失了最本真的思考能力,成为符合统治要求的驯顺的思想

同质体。此外,大洋国到处暗藏着监听器,巡逻警察不停地窥视人们的窗户,电幕无处不在。思想警察已经深入到了家庭,最亲近的人都在监视你的一言一行。在这个相互监视的社会里,个体生活在来自其他领域目光的包围之下,“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11]72}。在权力之眼的监督下,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情皆被冷漠和异化所替代,整个社会被纳入监控的范围内,成为极权支配的对象。

101号房将监视这一规训手段发挥到了极致。这个边沁式的“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con)通过使掌权者能看见一切又保持自己不可见的凝视手段,随时对有不合乎体制要求的个体进行肉体和精神惩罚,从而达到警示、规约主体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人的凝视“形成一种疏离的作用力,使得自我不断增强关于道德的好与坏的判断”^{[12]205}。因为处于不可见的状态,“一旦囚犯无法确定他自己是否被监视,他就变成了监视自己的警察”^{[13]32}。至此,凝视便具有了压制性和生产性的双重功能。大洋国的个体不仅成为被监视的客体他者,同时也沦为凝视下的自己的看守,从而发挥“自我惩戒”的功能。权利之眼的“凝视”不仅实现了对个体的标准化改造的目的,也达到了极权统治由下而上的微观模式的自动运行这一目标。

三、话语建构下的主体

在福柯看来,权力和话语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权力的运作方式体现得最为彻底也最为复杂的地方就是话语”^{[14]305}。话语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始终处于权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其次,在主体和话语的关系上,福柯认为主体不再支配着语言,主体成为话语建构的产物。《1984》里,统治者正是通过操控话语权,施行对个体的话语建构,进而维护其极权统治的。

首先,掌权者进行话语操控的方式之一是对个体进行外部话语控制,对其施行言语禁令。大洋国的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意识领域无不受到严格监管,个体毫无言论自由和人权自由。小到写日记,大到政治倾向无一不在严格的管控下。作为真理部记录司的一名外围党员,温斯顿的主要工作就是篡改、销毁一些与当前需要不符的新闻或历史文件,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就像是一张张被不断刮干净后重写的羊皮纸”^{[6]103}。幸运的谎话若被载入史册,就将成为

真理。这种真理成了“福柯意义上的一种事件，一种社会网络中的话语实践，一种具体而微的权力工具……真理的重量等价于飞溅的唾沫”^{[15]188}。凭借至高无上的地位，党能随意界定谁是敌人，谁是人民，谁存在过，谁是非人。大洋国的真理内核早已荡然无存，到处充斥着谎言，人人变得黑白不分，成为有“双重思想”的语言符号的产物。

从内部对主体进行思想灌输和话语规约是掌权者操控思想的另一手段，这主要是通过发明“新话”，即建构新的语言体系来实现对主体由内而外的思想控制的。通过编纂新词，消灭老词，精简语言，使用新话达到缩小人们的思想范围的目的，从根本上取消一切犯思想罪的可能。因为“词汇越来越少，意识的范围也会变小”^{[6]110}。可见，一方面，权力生产着话语，另一方面，话语又传递、强化和生产着权力，在“老大哥的全能性，党的一贯正确性”的信条下，话语对主体的规约作用加固了掌权者的极权统治。在权力和话语的交替编织下，主体不再是语言的言说者，反而沦为臣服于语言、深陷语言图圈的囚徒，成为被言说的主体，而言说主体的死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受主体支配的现代人之死。

四、结束语

《1984》中的极权统治正是借助压制、消灭等级空间中出现的异质性、流动性和差异性，进而保证极权统治的同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最终实现维护自己终极统治的框架范畴的。在极权统治范式下，任何个体的异质思想和反抗行为都受到严格的监控、改造、洗脑、甚至消灭殆尽。尽管温斯顿最终出卖了自己，出卖了秋莉亚，被改造得“爱上了老大哥”，可等到“灵魂洁白如雪”后，也还是难逃被党迫害致死的命运。在极权空间的规训下、在权力“凝视”的标准化改造下，在话语的支配和建构下，主体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现代理性主体，而成为形而上学的虚构和假设，成了被权力拆解、无根漂浮的碎片。然而，通过揭示主体所处的后现代困境，奥威尔并未因此完全陷入悲观，他对人类希望犹存，“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从温斯顿日记里的一段文字或许可以管窥文本所折射的希望的空间和奥威尔强烈的人文关怀：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致未来，致过去，致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千差万别、不再与世隔绝的时代——

致一个真理长存、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向你们致敬！”^{[6]94}

奥威尔借用讽喻的利器表达了自己的反极权主义思想，以一种后现代的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他“所理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构想了那种超越二元对立、具有无穷彻底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的乌托邦空间，将希望寄托在异质性、差异性、多样性的无产者身上，以此启示人类找寻走出极权生存困境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 李海. 人的诞生与死亡——福柯的主体批评理论与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9(4): 194-197.
- [2] 米歇尔·福柯. 古典时代疯狂史[M]. 林志明,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3]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4]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 [5]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6] 乔治·奥威尔. 动物庄园·1984[M]. 呼天琪, 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1.
- [7]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M]. 林骧华,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8]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9]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10]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第四版.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11] Lacan J.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M]. Translated by Sheridan A. Middlesex: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 [12] 方汉文. 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
- [13]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政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14] 董学文. 西方文学理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5]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编辑: 朱渭波)